

1217 俱乐部 年度书系

杨早 萨支山 编

话题 2009 专题版

把个性化的思考留给历史

Topic

谁高兴？谁不高兴——《中国不高兴》的故事新编
唯思想不可检举——知识分子与「告密」

「以苦难谄媚崇高」——《南京！南京！》的想法与水准

「谍谍」不休：谍战片的后冷战书写

张爱玲密码——众声喧哗《小团圆》

热脸相向与冷面相对——「8·8」水灾引发的两岸民间互信危机

贾君鹏：谁喊你回家吃饭？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1217 俱乐部 年度书系

杨早 萨支山 编

话题 2009

专题版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题 2009 / 杨早, 萨支山编. —北京: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0.1
(1217 俱乐部·年度书系)
ISBN 978-7-108-03401-4

I. 话… II. ①杨…②萨… III. 社会问题—研究—中
国—2009 IV. ④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4616 号

责任编辑 卫 纯

封扉设计 鲁明静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965 毫米 1/16 印张 20.5

字 数 245 千字

印 数 0,001—9,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告白 2009

《话题》已经出了五年。虽然每年我们都在调整，但今年的变化可能是最大的。

从2006年编辑第一本《话题2005》起，我们的初衷，就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表达我们以文学的方式对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思考；二是关注媒体报道的热点，对“热点何以会形成，它如何被媒体、公众接受与传播”加以记录、评析，进而勾勒“中国社会精神生活的变化”。

这两点，乍看上去都挺好，并无冲突。但实际运作时，总是遇上难以自洽的矛盾。不管我们是否刻意，当书名被冠以年份的数字时，它很自然地会被看做一本年鉴式的读物。读者会非常直接地提问：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些话题？为什么没有这个，又为什么有那个？

不同读者也会有不同的要求。有身为白领的读者说：我们看这本书，就是为了听听你们这些博士如何看热点！也有媒体的朋友讲：对那些大热点，我们早就审美疲劳，你们能不能提供一些别的？

这两种要求都很有道理，而且都符合我们的初衷：“与公众对话”与“记录精神生活”。但是，选择标准总会成为问题。我们能提供的最好产品，当然是针对那些触动了我们内心的事件，又能从专业角度加以独特的观察与分析。只是，并非所有的热点事件，即使是文

化事件，都能有合适的作者，合适的研究资源提供表达的支持。如果过分顾及“年鉴”的全面，则不仅会人云亦云，也会挂一漏万。

关于这一问题，四年来我们一直在调整。增加“关键词”、“年度综述”与“月份牌”，都是试图从宏观上把握全年精神生活的变化脉络，而专题的选择与写作，又大力提倡“谱系感”、“新闻历史化”，都是尽可能地拉开与一般“媒体盘点”的差距，形成自己的独家面目。

到了2009年，虽然大言不惭地说，《话题》每年都在进步，但是我们仍觉得调整效果未臻完满。一方面，学院出身的作者多少会有削足适履之感，专题严格的体例要求也会限制潜在作者的发掘；另一方面，“热点的选择标准”仍在不断被读者质疑。

于是，我们再次讨论调整。这一次，索性将全书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称为“专题版”，主要汇集俱乐部成员或特约作者最有感触、也最有把握的选题，需要凸显的是“独特”与“多元”，前者由作者的专业研究与思考能力支持，后者则由每篇专题后的“讨论”保证。

另一部分名为“热点版”，我们遍览国内诸种主流的周刊杂志，包括《三联生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瞭望东方周刊》、《凤凰周刊》、《新周刊》、《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南方周末》等，以它们的专题报道多寡为标准，综述国内媒体对最热点的事件、问题的报道与观察，再加以“评论之评论”，希望能够通过此种努力达成“记录精神生活变化”的目标。

这同样是一种尝试，通过差异化的写作与编排，让两部分的面目更清晰，诉求更明确。至于能否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期待，虽不敢必，愿戮力为之。

目 录

001 2009：谁在说？说什么？ 杨 早

专 题

008 谁高兴？谁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的故事新编 杨 早
十五年前：“第三只眼”超越二元——十三年前：大家都
来“说不”——2009年：“不高兴”的故事新编

021 讨论

027 【附录】外媒是这样评论的 黄 永

036 唯思想不可检举
——知识分子与“告密” 李洁非

046 讨论

056 “以苦难谄媚崇高”
——《南京！南京！》的想法与水准 颜 浩

“献礼片”的名与实——“抵抗之城”，变调之歌——角川：
一根被拒绝的“羊肉串”——“用文化融解坚冰”？

071 讨论

078 “谍谍”不休：谍战片的后冷战书写 张慧瑜

跨越冷战/后冷战的谍战片——从“女特务”到“兄/长”——
忠诚与背叛——被杀死的“信仰”

091 讨论

099 张爱玲密码

——众声喧哗《小团圆》 凌云岚

自叙与“窥私”——自供或自辩——退步或蜕变？

113 讨论

120 热脸相向与冷面相对

——“8·8”水灾引发的两岸民间互信危机 张霖

“血浓于水”：大陆百姓的同胞认同——“木马屠城”：台湾
民间的政治猜忌——“热脸遭遇冷脸”：错位的两岸亲情——结
语：两岸民间互信危机

132 讨论

136 贾君鹏谁喊你回家吃饭？ 萨支山

儿时的回忆，还是后现代的狂欢？——真的是商业阴谋吗？
——说了等于没说的“寂寞说”——本无自我，何来迷失？

143 讨论

月份观察

- | | | |
|-----|--------------------|-----|
| 150 | 1月：方生未死天地玄黄 | 萨支山 |
| 152 | 2月：是谁点燃那些火焰 | 凌云岚 |
| 156 | 3月：愤怒，向着历史与现实 | 段美乔 |
| 160 | 4月：错位的视角 | 颜 浩 |
| 165 | 5月：命运交错两生花 | 李婉薇 |
| 169 | 6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 施爱东 |
| 173 | 7月：全球喊MJ回家唱歌 | 李 晨 |
| 177 | 8月：山城红与黑，废都灵与肉 | 潘采夫 |
| 180 | 9月：你建国大业了吗？你被钓鱼了吗？ | 潘采夫 |
| 183 | 10月：国庆月的个人记忆 | 萨支山 |
| 186 | 11月：我推荐《蜗居》，不推荐奥巴马 | 木 鱼 |

2009：谁在说？说什么？

杨 早

在《话题 2008》里，我们已经预言了 2009 的平庸。真是这样吗？身处 2009 年的末梢，我不禁开始怀疑这个判断。也许，“平庸”只是我们的一种祈望？祈望在大癫大恸的一年之后，能有平安喜乐的一个年头，云霄飞车下来的缓步而归，马拉松终点的喘息休憩，曲终人散后的一钩新月天如水。

可是，“甲流”不答应，矿难不答应，车祸不答应，地王和房价也不答应。

然而，相对于 2008 年的大悲无语、大爱无言，2009 从头到尾都淹没在话语的浪潮之中，许多时候，不是事件本身，而是“话语”引发了震惊与骚动。

那么，2009，谁在说？说什么？

独语与哗然

从来没有哪个年份像 2009 这样，公众经由媒体听见那么多的“官员失言”，内容光怪陆离，无奇不有：从“我们是有身份的

人”到“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从“我拉屎要不要告诉你”到“他胃痛关你什么事”……“史上最牛官话”被多次刷新，观者的瞳孔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放大中失焦。

所谓“失言”，或许不过是实话实说。激起民愤的缘故，盖以为现代民主社会，官员当以民众福祉为意，又当注重公务员形象，岂可在媒体面前，放言无忌？对“官员失言”的批评，正代表着日益成熟的“纳税人+公民”的意识。

中国是一个“意识叠加”的社会，即在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各类意识的并存、对立与冲突。在“官本位”意识之中，上述话语不过是顺理成章，题中之义，何荒谬之有？

所有的事件之中，都有一个关键的角色转换：“媒体”究竟站在官、民哪一方？以此观之，当选本年度“最雷人官话”的“替谁说话”，质问虽然狂妄，却意味深长。中国的媒体从来被命名为“喉舌”，不过“为民喉舌”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官本位的传统中，媒体要负担“过滤器”的功能，如是，则“失言”不可能宣之于众，官员自然也无需在媒体面前维持民主政治“必要的虚伪”。不能不说，在今天的公众性事件中，大多数媒体越来越清晰地站在公众立场发言，虽然范围仍很有限，却勾勒出中国传媒的现代转型轮廓。

另一方面，官员们的这些狠话、错话，尤其是地方官员面对中央级媒体仍敢大放厥词，当然可以解读为这些基层官员政治素质低下，嚣张跋扈已成惯例，更值得留意的，或许是这些大胆话语后的“媒体脱敏症”。如果传媒的揭批于事无补，既不能解决固有的矛盾，又不影响当事人的宦途，甚至“失言”还可以模糊焦点，使舆论浪潮集中于官员话语是否恰当这一表象，则错话、狠话正不妨多说几句。

如果将这些“失言”看做官员以个人身份发表的“独语”，尚可

归因于个人素质问题，有关部门在轰动性事件中，置事理与舆情于不顾，悍然发布结论，则是更严重更霸道的“独语”。杭州飙车案中的“70码”，上海倒楼事件的“专家解释”，闵行钓鱼执法案中的“并无执法不当”，在在都让人闻见“朕即国家”的专横气息，难怪公共舆论一片哗然，必欲得真相而后快。

这里不必纠缠细节，而是要提及数年来屡屡回荡在中国精神生活之中的“集体/个人”的变调。以集体利益还是个人权利为本位，对事理的判断难免大相径庭。不是要否定集体本位论述的合理性，“舍小家顾大家”与爱国主义仍是宝贵的道德品质，只是，集体本位理念极易被借作利益集团的挡箭牌与遮羞布，举凡“稳定”、“和谐”等美好的名目，倘被用做草草了事、草菅人命的说辞，则个人权益受损之时，即集体福利蒙尘之日，亦即治人者威信荡然之际。这层道理相信大家都会懂，只是有人无心弄懂，有人装做不懂罢了。

或许只有“躲猫猫”躲出了一点新意。年轻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主动现身网络，与网民对话，并引介有知名网友参与的调查组进入看守所调查。无论这是否一种新派作秀，关注舆论并意图向舆论有所交代，已是一种难得的进步。这一点不因网民调查组无功而返而改变，混乱的进步仍是进步。

沉默的声音

沉默者如何发出声音？一个古老的难题，在2009年依然近乎无解。

前两年一位年轻的上海黑车司机将“钩子”捅死，被报道成一桩单纯的刑事案件；白领张军在上海闵行区被“钓鱼”，通过正式渠道

行政诉讼，久拖不见下文；直到初来浦东区打工即被“钓鱼”的孙中界断指鸣冤，这才引发了媒体地震，“钓鱼执法”有废止之势。

同样，一定要“开胸验肺”才能让同难弟兄获得工伤补偿，一定要从“投掷燃烧瓶”到“点火自焚”的“暴力抗法”，才能引发学者与人大代表提议重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一切似乎在告诉人们，沉默者并非真的沉默，但他们的声音想让整个社会听见，不仅要付出血的代价，而且要付出“足够的”血的代价。似乎只有血、泪与冤屈的累积，才能推动公共事务那些微的进步。

人们总认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应当可以防患于未然，依靠体制防范与舆论监督，使个人遭遇的不公、压抑与伤害，能在最短时间内反映出来，并触动体制的自我修补功能。而今，却是社会普遍愤懑的情绪，填补着“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距离。

这些事件，能够展露、轰动并最终生效，总算是民主社会正在成熟的表征。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不知道同类事件，要到第几次，要到何等惨烈的程度，才能达成骆驼背上的最后一压。哈耶克曾说，当公民无法预知政府政策，也无法预知自己行为结果时，社会就处于一种危险状态之中——每个人都会选择最短视的获利方式，来自我保护，整个社会的信任机制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设若我们目前获得的资讯是事实：“奥巴马女郎”王紫菲用二十万元的成本打造了一夜成名的奇迹。那么，这又是一场典型的单线式营销案例，它只求主体成名，却无需对其注入任何有意义的成分。与此相呼应的，是人人都感染的“炒作过敏症”，明星绯闻是炒作，演员国籍是炒作，篮球选手“车震”是炒作，连王紫菲出来“含泪自曝”也可能是“第二轮炒作”——当你付出眼球与关注，来参与这一场场闹剧，内心又同时充斥着为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无力感。

千万个沉默者联合起来，的确能发出足够响亮的声音。但这个响亮的声音正在诉说着什么，却未必符合沉默者们的初衷。连网络推手也承认：网络炒作有太强的不可控性，他们也只能把“炒热”作为唯一目的，几乎无法预知话题的方向。无论“贾君鹏”是不是一场精心的策划，它代表的只是无数沉默者无所指向的寂寞。即时宣泄与无意识狂欢的背后，人生不过是摆满现实世界与网络空间的一套套“杯具”。

还有一些人，他们始终沉默。他们接受了父母安排，顶替别人的名字上完了大学，或是伪造民族身份获得高考加分。被曝光的王佳俊、何川洋，自然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走上一段始料未及的精神苦旅。那些未曾曝光的，是暗自庆幸？还是心怀愧怍？在显失公平的教育体制中长大的孩子，学识技能如何且不去讲，他们将来会如何回报这个丛林般的社会？那些如风似箭的车声灯影里，是否就坐着这样一位醉醺醺的新生代？又有多少失去应得机会的贫者，会像张云良那样，亲手点燃吞噬人我的火焰？

因此，人们不愿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声音，从局长的天价烟到市长的假文凭，再到检察长的豪华车，超大国企的豪华吊灯，从这些蛛丝马迹开始，去捕捉、去抨击、去举报每一桩溢出“公正合法”之外的行径。正如狗仔队的狙击多少打击了娱乐圈的乱象，“网络举报团”的反复成军，让不择手段的营私与挥霍至少不再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畅通无阻。星星之火，也携着希望的光亮。

言者，听者

古话说：甘言顺耳，忠言逆耳。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中，好赖话总是混杂交织，言者未必无意，听者总须有心。

《中国不高兴》的见解，有多少严肃性，是之外的学术问题。从书商的营销来看，明显卖的是耸动标题与极端态度，因此才会有跟风的《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与《美国不开心》。幸而，中国社会毕竟还是比十三年前《中国可以说不》出版时要成熟得多。在这一前提下，亦不妨将《中国不高兴》的流行视为社会情绪开启了一道安全阀，纸面上的宣泄总胜于行动的宣泄。一般来说，平和稳健的见解总是不如极端言论那么吸引眼球，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也自有其民意根基。只要背后没有隐形的操弄，不同的极端言论呈现于公众眼前，以裨“取其两端用其中”，也不失为言论自由的先河。

《中国不高兴》深恶痛绝的“文艺腔”，目标有没有找准，大可怀疑。近年倒是时见另一种“文艺腔”，如举世瞩目的邓玉娇案，与旧年的杨佳案非常类似的现象是：案情尚未明晓，真相仍在流亡，网上即有人气急奋笔，大撰“《烈女行》”一类的诗谣。这不过是古时闻风传奇、笔记录遗的老调，只是从前因事设喻，不过是传扬圣教，而今在网上笔墨兴风，却足以迎合固有的民间想象，影响案情的如实呈现。基层法治多见黑幕，这是常识，但以此推断无官不黑，无民不冤，又添枝助叶地加倍渲染血腥与情色画面，也未必是值得鼓励的“民意表达”。前贤论“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之别，即在作者是“有共同忏悔之心”的剖心沥胆，还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置身事外。至于趣味专在津津乐道于私隐恶俗之处，则是等而下之的“黑幕小说”。

相对于《中国不高兴》的偏执于大国崛起、领导世界的想象，务实理性的公民参与，是舆论界最大的收获。从去年的地震救灾到今年的不懈追问，“公共知识分子”总算不再作为一种身份（喜欢谈公共问题的学者专家），而是成为一种公民的自觉选择。其中最耀眼的当属韩寒，这位以反叛姿态起家的“80后”代言人，今年在多起公共事件的

讨论、追问、质疑中展示着他的理性思辨力与公众影响力。这是最与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相异的典型人物：他不以写作或体制内其他职业为谋生渠道，也未携有与各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对新的世道人情洞悉通透而不妥协，不排斥商业运作又清楚边界何在，自觉地运用巨大的影响力建构一种成熟公民形象与理性思维方式。不夸张地说，韩寒的博客文章很好地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for people”、“to people”的特性。

韩寒当然不是“知识”的代言人，他仗以评判与行事的资源不外是“常识”，但正是非学院的背景与凭借常识的知行合一，让他成为当下社会“公民”的最佳显影。老实说，笔者对韩寒仗以成名的小说创作，一直评价不高，但对其“逆取顺守”的言行态度，不吝赞词。韩寒成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意见领袖，恰可以让人窥见中国社会公民意识的走向成熟。

以此看来，《中国不高兴》欢呼的“四月青年”，也不见得是有人臆想中的“新红卫兵”或“新义和团”。泛意识形态的消退，也许正是从这一代人开始。12月，张艺谋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上映。这位知名导演，选择了一条最保险、也最没有创意的方式，借用经典剧本与人气演员，以“愚乐”的结构，来谋求最小的政治风险与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传统的中国思维之中，这样一位奥运会与国庆大典之后被某些媒体呼为“国师”、“国导”的大师之新作，似乎应当享有着不言自明的豁免与拥戴。然而即使是面对人海仪式欢呼雀跃的观众，也有许多人对《三枪拍案惊奇》发出了剧烈的斥声，这是让人欣喜的变化——将政治的倾向与艺术的鉴别分别对待，反对愚蠢，反对矫情，相信已是被多元文化培育的年青一代的普遍诉求。对既有体制定位的叛逆，将从鄙薄张艺谋、春晚、央视这些超级怪兽开始。

这就是2009。阴霾中，隐现的微茫曙色。

谁高兴？谁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的故事新编

杨 早*

《中国不高兴》在 2009 年的出炉并走红，几乎是一种必然。从远因看，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一直在中国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时隐时现，几乎每隔几年、十几年我们就能听到它一次盛大的欢唱，而且，中国越融入全球体系，扮演的角色越重要，这种声音就愈响；从近因看，2008 年发生的诸般大事，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全球火炬传递、北京奥运、“神七”上天，都在激荡着中国人被百年历程锤炼得异常敏感的“中外关系”那根神经。“不高兴”非常形象地表达了那种被伤害、被打压、被边缘化的委屈心态。

虽然非常容易从这本写作风格相当随意的畅销书中找到大量的硬

* 杨早，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话题书系”著有《缘起》、《安得广厦千万间——房产 PK 与百姓心态》（《话题 2005》），《告白》、《这一年》（《话题 2006》），《2007：被放大，被忽略》、《三级片，“汉奸电影”——〈色，戒〉引发的文化震荡》、《学术规范还是传播法则？——我们该怎样评价于丹》（《话题 2007》），《2008：五种情绪》、《错位的想象——奥运：西方媒体报道 VS 中国民众心态》（与黄永、陈梦飞合著）（《话题 2008》）等。

伤与瑕疵，反驳这些知识上、逻辑上的缺陷也毫不费力，但笔者认为对它最好的讨论方式，是尽快地绕开此书具体的论述，将目光聚焦于《中国不高兴》如何迎合中国社会日益鼓荡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是如何将这一系列的读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大多数传媒评论必定提及1996年的同类著作《中国可以说不》来看，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这不是破天荒第一本鼓吹民族自大、国家主义的读物，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本。

十五年前：“第三只眼”超越二元

对于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而言，1989年都造成了多方面的伤害。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或许是，中国与西方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蜜月期宣告结束，亲西方的文化姿态，从一种文化共识演变成文化立场的选择。被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搅得头晕目眩的中国知识界需要冷静下来，重新调整与核定自己的位置。当然，变化不只发生于中国，1991年的苏东剧变，使得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时移势易，对世界的认知与想象也需要重组。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是一个调整自我与他者认知的范本。这本政论性著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古怪形式出现：版权页标明作者是“[德]洛伊宁格尔”，译者“王山”。“出版说明”里也煞有介事地介绍“L. 洛伊宁格尔博士（1953.8— ）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自80年代起，洛氏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国情和国家政治结构的专著。他的观点和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评述，对西欧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